

考古
考古论文集系列

中国考古学

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 张忠培 著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张忠培 著

科学出版社

1999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系统地总结中国考古学历史，尤其是田野考古实践及综合研究写出的专题论文集，内容包括：历史的经验、考古学研究对象、基本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他学科研究考古学的原则，等等，作者均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的思考。作者认为：考古学透过遗存与其呈现的时、空关系，解析考古学文化，研究历史的一个侧面，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培养专业工作者以及推动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理论及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读者对象：考古学本科生、研究生及专业研究人员。可作为考古学在实践、理论、方法方面的专业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ISBN 7-03-007173-5

I. 中… II. 张…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973 号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 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9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1/4 插页：1

印数：1—1 800 字数：265 000

(如有缺页倒装，本社负责掉换。〈环伟〉)

序 一

自 1994 年至今 5 年间，我仍未实现将讲义整理成《考古学方法论》一书的愿望，却写了《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拓者》、《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聚落考古初论》、《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和《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等 9 篇文字。现将其和曾收在《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一书中的文字，汇集成了这本册子。

这本册子中的曾集在《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的 15 篇文字的写作、发表等情况，在原书的“序”及各文后的后记中，均作了说明。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将原书的“序”保留了下来，是为本书的“序二”。收在本书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和《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两文。前者，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一书写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后者，我在该文的文后作了点说明，现需讲清楚的是，我之所以能有机会和吴怀祺、王晖等三位朋友聊天，是他们受了白寿彝先生的委托，而这篇文字是王晖同志整理出来的。白老已 90 高龄了，是老一辈史学家，是我的导师苏秉琦教授的老朋友，他们之间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他为人敦厚，在中国史学的广泛领域中均做出了影响

深远的贡献。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学步集》，但一直无缘获得面教，然而，自1990年我跟随秉琦师面见白寿彝先生至今，一直得到他的关怀与爱护。他委托吴怀祺等三位朋友对我所作的这次访问，无疑是对我的又一次抬爱。藉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再次表示对白老的深切感谢。我也感谢为整理这篇谈话记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王晖同志。收在这集子中的其余7篇文字的写作或发表情况，均在文后有所说明。

道者，道路、道理、方法也。收在本书的24篇文字，基本上涉及到了中国考古学以往走过的道路，今后该走的路，考古学是什么样子的学科，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何以层位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何运用层位学、类型学，怎样通过遗存及其与时、空的关系探讨考古学文化，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研究历史，考古学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而只能接近历史真实等等问题。总之，讲的无非是考古学之道。考古学之道，远非一道。何者是正道，检验的标准，只能是新的实践；道法之高低，则视在等量遗存中吸取信息多少及其精确程度而定。我讲的考古学之道，虽源于实践，也被一些实践检验过，然而，这检验并未终止，所以，这道是否正确，以及水平的高低，仍待新的实践检验。为此，我将已写的文字，集中一书，并名之为《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张忠培

1999年2月于小石桥寓所

序 二

几年前，一些朋友建议我编一讨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我虽感兴趣，但觉得主、客观条件仍不成熟，直到 1993 年春，才决定做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拟收进书中的论著目录。这年 9 月，在郑州西山考古工地将这个目录征求先后提出此建议的诸朋友意见。1994 年 3 月，在他们的催促和帮助下才把现在名之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集子编成。

这本集子共收集 15 篇文章。其中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和《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三篇，分别是和黄景略、俞伟超及马淑琴合作写成的。无疑，《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和《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虽把我处于作答的地位，其实也是我分别和徐天进、水涛、宋新潮、赵化成、周星、何努、李水城、李卫东以及贺云翱、谷建祥等朋友共同合作的产品。陈雍及李伊萍协助我作了《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的整理订稿工作。《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安徽省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据我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成初稿后，再由我改写成的。此外，田建文作了《中国考古学史的一点认识》及《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笔记，并整理成初稿。为编此书校读这些文章时，我和他们以及促成、帮助我结集的那些朋友交往、合作的情景，再次从脑中浮现出来，往返于记忆中，终究难能消失。

诸文校读情况，分为三类。一类，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地层学与

类型学的若干问题》等等，校读时，只字未动，这类占大多数；二类，这类数量较少，如《当代考古学问题问答》等，只改了一些文字，原意未改；三类，只有一篇，即《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考古与文物》发表此文时，编辑部未曾和我们商量，即作了较多的删改，影响了一些原意，故这次依原稿发表。

结集的这些文章，也可大致分为三组。一为通过对梁思永、苏秉琦及夏鼐诸前辈的学术著作的评论，即试图从史的角度论述理论、方法。研评历史，离不开从今往前看，实则也是一种古为今用。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对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来，我很想就李济先生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论。至今，我基本上只读过他在大陆时发表的文章。他在1949年后于台湾发表的论著，我读的很少。故此，对他作些评论的愿望，终不敢付之实施，这是颇为遗憾的。二是直接谈理论、方法的。讨论的范围，大致包括：考古学是什么，什么是考古学研究对象，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层位学与类型学为何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如何运用这类问题，等等。理论、方法的可贵性，在于它的实践。我的讨论，面对现实，参与了考古学当前问题的讨论。三组，只有二篇，内容较杂。其主要内容，也涉及到了理论与方法。总之，这些文章是从中国考古学以往和当今实践进行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故将这集子取名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结集的动机，一是参与理论、方法的讨论，向同行请教，二是希望在中国考古学当前及今后一定时间内的实践中起点作用。总之，是为了引玉才抛出这些不成型的砖块。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先后分别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授《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论》的课程。边研究，边授课，同

时又将认为有些心得且适时的讲义，撕了下来，整理后发表出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迫于朋友索稿，也写了两篇。1989年下台后，自己选择的主要任务，是还经手过的田野考古工作所欠下的《报告》债。但是，考古学问题讨论的诱惑，朋友们的催促，使我尽力压下的将讲义整理成《考古学方法论》一书的愿望，时时浮了上来。《报告》债不还清，此书不能写，这是我既定的决心。于是，当压不住那浮上来的写《考古学方法论》的心愿的时候，又动起笔来，写了四五篇，以应付自己认为的当前考古学形势的需要。这就是写这些文章的大致的来龙去脉。现在把它们集结起来，仍然是我在可以预计的三四年内写不成《考古学方法论》的缘故。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即听听同行们的批评，吸收意见，可用于日后写《考古学方法论》。

集子中的文章，写作的年代跨度，约有十多年。这期间的认识，我是有些变化的。如写《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时，是使用“地层学”一词，表示当用“层位学”这词才能表述的内涵，尽管当时已自发地感到此方面的问题，并在此文中已萌生了这一思想，但直到后来写这类文章时，才径直使用“层位学”一词。又如写《浅谈中国考古的现在与未来》一文时，还认为“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建筑考古”及“农业考古”，是涌现出来的新学科，随后写的文章中，对这些认识至少是提出了质疑。还如我曾经接受一般流行的认识，把“历史”，有时甚至是“遗存”，当成了考古学研究对象，直到写《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时，才基本上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当然，还不止这些。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不仅是说明自己认识的一些变化，同时，也是为向读者声明：如果看到这类矛盾的话，请以较后发表的认识作为我的观点。为此，我在每篇文章的后面，写了发表的时间，有的还说了成稿的日期。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

干问题》发表后，我才认识到要讲清层位学及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必须先说明考古学研究对象以及什么是考古学，而要讲清考古学是什么，就必须搞清楚考古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这样，我又接着先后写了《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等几篇文章。尽管我讲授过《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论》这类课程，发表的文章又是在这基础上写出来的，但发表之后，还感到仍存在如上所说的问题。显然，无论是授课，还是后来写文章时所做的研究，仍是一个由表入里、自点到面，甚至是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看来，我对本书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仍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深入的思考，仍处在颇不自觉的，被探讨的问题的内在逻辑牵着鼻子走的认识阶段。

从中国考古学的丰富的实践中，去探索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这一认识的取得，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49年以前，这个学科在实践中已摸索出一些适用于实践的技术、方法、理论，但这蕴藏在实践中的理论、方法，还未曾被人们从实践中剥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简单说来，可大致作如下概括：50年代前期，热衷于学习前苏联，把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定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轻视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实践，当然就忽视从这实践中去探讨理论、方法。到1958年，把层位学，尤其是类型学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之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作为教条，全面否定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从70年代后期始，以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论为起点，开始回归到正确的轨道，然而，自80年代后，又遭到从西方传来的新考古学的

干扰。曲折与干扰，形式不同，实质则一。问题出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透物见人，还是搞从人见物，即从论到史；二是是否重视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去探究考古学理论、方法。我们应坚持主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探索透物见人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古代除曾存在过相当发达的基本上属内陆文明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连绵不断，即史的过程的完整；二是多元一体，即史的多样性及其联结性。同时，当前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城镇化，破土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从这古、今中国环境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不只是仍处在蕴藏状态，已相当程度地裸露出如下引人注目的情景，即：研究工作规模巨大，和遇到的遗存丰富、多彩且具自身特色外，还存在时、空的连贯与联接性。正确的理论，是人们对所研究的客体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认识；科学的方法，便是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新实践的途径。实践是理论的丰富源泉，因此，作为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在中国考古学已具备上述客观条件下，完全可以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科学的理论。坚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寻找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不仅能推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也可能对世界考古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我们不应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主要着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探寻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当善于吸取适用于中国的境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中国考古学者应本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勇敢地站立起来。

（该文成稿于1994年4月16日，是为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写的序言，今将其中的聚落考古的内容删去后，再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作者 近 照

目 录

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

- 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 70 周年纪念 (1)

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

- 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 50 周年 (6)

中国考古学路上不会消失的足迹

- 悼念夏鼐先生 (18)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 (26)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

-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 (47)

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拓者

- 沉痛悼念恩师苏秉琦教授 (54)

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 (60)

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 (73)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 (78)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 (102)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125)

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148)

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152)

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 (162)

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 (177)

聚落考古初论..... (199)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的检讨	(205)
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11)
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	(218)
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	(226)
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	
——答《东南文化》记者	(241)
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	
——《史学史研究》王晖访谈记	(265)
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	(283)
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	(302)

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

——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 70 周年纪念

1926 年 10 月 15 日，李济先生踏入西阴村遗址，定好基点、布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这短暂的一刻成为历史的永恒。

这已被海内外学人公认：“是国人出于明确目的、有计划地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①，同时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相较，发掘方法有所改进，揭示的遗存也比在仰韶村所见的单纯，除数量极少的或早或晚仍属仰韶时代的遗存外，基本上均属于现被称为西阴文化的遗存。这里指出的最后一方面情形，在当时显得颇为重要的是为澄清仰韶村发掘而造成的文化内涵概念的混乱提供了一根标尺。

迄今，70 年矣！比我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还要长。静思，漫远而悠然，多少回春风飘飘、秋雨潇潇，多少次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顾首，倏忽弹指间，不禁叹宇宙浩渺，恨人生短暂。当神游的思绪返回四壁摆满考古著作的书房，又庆幸自己此生逢时。

这就是，敢于、勤于和善于田野考古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用科学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我和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能够认识几千年甚至上百万年前的人类文化，从而实现多少前贤先哲们梦寐以求的古今对话。已逝的历史像长河。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当今观史，正如俯瞰黄河，从西北雪山汇聚涓涓细流，越山渡岭，扬

^①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后记》，《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波荡沙，奔腾东涌，直至黄色浪涛拍向东海之滨。令人心动神驰，荡气回肠。

当今天我们依据考古学已基本完成了中国古史的重建，尤其是其中的史前史重建工作时，应当铭记作为国人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李济先生的伟绩。这位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与他在这一领域迈出的第一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西阴村的发掘。我们今天能够从中看到：

——先生洋溢着维护民族权益的满腔的爱国主义精神。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由清华学校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进行的。这是第一个中外合作的考古项目。双方商定的合作条件中最紧要的几条是：

- (1) 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 (2) 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担任；
- (3) 报告用中文英文书写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 (4) 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签订的这些条件，不仅见于文字，重要的是全付诸实践，开创了不掺杂任何私利的维护了国家主权的中外合作考古的先河，如张光直先生的评论所指出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①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先生拥有坦荡无私的胸襟。当《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发

^①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后记》，《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表后，他让梁思永先生整理和研究发掘所得陶片，并由梁思永先生写成《山西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作为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

——先生采用多种科技手段研究了西阴村遗址及发掘所得的遗存。在他主持下，西阴村遗存中的陶片成分、火候和石器的岩质，得到了测试和鉴定，袁复礼先生研究了山西南部的地形。

——先生怀有高远的目标。他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讲得非常明白：“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了中国北部无疑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肃、东至奉天，他发现了很多这一类或类似这一类文化的遗址。因为这种发现，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着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① 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目标，设定为揭示及研究历史，和多学科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方法，虽非始于李济先生，但他却是这样对待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位中国考古学者。

1928年，李济先生接受了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之邀，担任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是其一生从事考古事业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乃至古史研究

^①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在傅斯年先生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一方针指导下，李济先生主持的殷墟发掘，向世界展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灿烂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的基础，把中国考古学的发掘及研究水平推到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引起了世人注目的同时，作为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力军，对打破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和附以金石学的狭义历史学的治学传统，开拓新的史学领域，和冲破当时史学随同“疑古”步入的困境，使古史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化，以及导致广义史学得健康发展等方面，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一是他从西阴村这个高起点走进了殷墟，二是他从不墨守成规，在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实践中，保持并发扬了优势，又不断进取，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

今天，中国考古学已取得巨大进步，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来的是崭新的面貌。这与继承和发扬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开创的，而后在殷墟研究形成的优良传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有责任把这一优良传统保持下去。这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的需要。以李济先生作为一杆标尺、一面镜子，对照自己，我们是否在对外合作中不带任何私利而维护了国家权益，弘扬了祖国文化？是否公开资料提供给他人再研究？是否把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否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遗存？是否将考古学的目标设立为揭示及研究历史？等等，这些问题，总该引起我们深省吧！

李济先生于1979年逝世了。在他诞辰100周年之时，我们仍感到他对待中国考古学的精神，应该不朽；他开创的传统，只该光大。中国考古学的前途，是自李济先生以来几代人已走过的道路向前展现的路标。“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中国考古学的希望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身上。让我们共同祝愿、共同